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age is a solid red color. In the top left corner, there is a white five-pointed star. From the star, several white, curved lines resembling stalks of grain or wheat extend diagonally across the upper half of the image.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reminiscent of mid-20th-century political posters.

革命与组织

革命与组织

红影 赤星

Copyright©广大被压迫人民 2025

报刊下载 <https://codeberg.org/liuxing>

在 Xmpp 协议客户端中加入群组

ilemotoc@conference.verdammung.org

32170 字 78 页

2025 年 12 月 第二版

《流星报》编辑部

重振旗鼓：组织，整合与政治报 P4

当前革命的组织任务 P26

混乱融工潮：组织建设的失败 P57

如何理解“左翼圈层化” P68

谈组织与革命问题 P71

重振旗鼓：组织，整合与政治报

序言：割裂相对性的绝对真理

真理。关于真理，我们不想多谈，引用一段艾思奇同志的话吧。“他们抽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结论，企图一劳永逸地按现成公式行事。他们形而上学地割裂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抓住了真理的绝对性，丢掉了真理的相对性。他们把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它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时期里，给我们提供了克服小组手工业模式、把各地分散的革命小组工作、思想集中起来的手段----利用“全俄统一的”政治报。政治报“路线”在现在的造反革命社与《燎原》刊物眼中的确也成了“真理”，这种“真理”不仅是割裂开相对性的，（相对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而且通常成了被狂热崇拜的封建教条。且看造反革命社是怎么说的吧。“政治报能囊括从小组乃至党的建立过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具备这样长久的计划性呢？”（同学们看来并不了解中国革命客观情况“对应”列宁在《怎

么办》里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什么时期，就已经把社会民主党第三个时期采用的策略硬套在眼下中国革命上，把政治报看作仿佛脱离社会的，从零起步到建党的唯一必要条件)，以及他们把政治报看成不区别于现在和上世纪火星报时期各个小组共同参与的一项“共同工作”（这更是曲解了列宁“创办”政治报的原意，关于这点我们后面再详细叙述）。问题实在太多了。

这些同学拿从《怎么办》当中摘取只言片语机械汇编成当今革命斗争的真理，以它为唯一的标榜指责《流星报》“不做共同工作”.....在这之前，我们真的想问问：关于政治报，同学们究竟知道多少？“统一的政治报联系”究竟怎样才能现实措施中“让全国各个小组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什么政治报能成为“集体的组织者”？想必你们通常的回答都是“政治报就是脚手架，能集中联系起分散在各地的小组，统一思想.....”这只是在列宁的著作中不加分析地摘取最易懂的直陈语句，丧失了最基本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为什么政治报是集体的组织者？因为政治报是集体的组织者，把运动整合到一起.....这难道不正是将列宁主义割裂出片段，将其视为文化符号的体现吗？

历史遗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时期”

列宁在《怎么办》的结束章节总结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三个时期。本文末有附列宁的相关原文。我们在这里不多赘述，来看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时期。

如今中国各地已经出现了小型地方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通常是大学生或高中生），这些小组的架构和学生马克思主义兴趣社团几乎没有区别（兴趣社团也可以有领导者，也可以组织活动甚至发表报刊），他们缺乏纲领。甚至根本就没有制定过纲领。如果有所谓纲领，那一般是摘取那三个伟大导师名著里的只言片语拼凑起来的，丧失计划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一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组织的理论微弱产生（实际上“理论”与小组实践一起陷入时间闭环）的时期，甚至都谈不上纲领的制定，更谈不上“纲领的巩固”，连列宁所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时期都对应不上。

列宁提出创办全俄统一的政治报的历史背景又是什么呢？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时期。注意，虽然列宁说这一时期是混乱、瓦解和动摇的，但是它仍然历史地建立在第二时期使社会民主党作为人民群众的高

潮出现的客观条件之上，运动本身还在继任第二时期继续发展，这些也是列宁在原文中提到的。

《火星报》在 1900 年 8 月发表的《编辑部的话》是这样描述当时的革命形势的：“我们正处在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极端重要的时刻。近几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我国知识界传播之快，是异常惊人的，而与这一社会思潮相呼应的却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独立产生的运动。工业无产阶级开始联合起来同自己的压迫者斗争。他们开始如饥似渴地向往社会主义。到处都出现工人小组和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地方性的鼓动小报广为流传，社会民主主义的书报供不应求……运动在继续发展，并且席卷了更广大的地区，它日益深入工人阶级，愈来愈引起社会上的注意”

在这个时期，俄国革命的一些“领导者”还单方面停留在第一时期原则上“解决问题”，倒向自发高潮，不从实际上立即着手解决问题（建立能领导群众运动，主要是工人运动的党）而把我们拉向后退。

此时党的最基本雏形早已形成，它已经经过了婴儿时期，走向童年与少年时期了。

对比现在中国，显然可以知道，因为各地组织理论

贫乏，没有纲领，和兴趣社团毫无区别，我们必须提出地方组织迅速政治化的号召（关于政治化，可参考流星报公开档案的《谈组织与革命问题》），是在从实际上解决问题的时候也着眼于原则上（！）解决问题。没有一个细致到建党雏形的长期参考计划几乎不能强烈地使地方小组同志们认识到政治化的重要性，也几乎无法使地方小组形成具骨干作用的思想、理论。《流星报》在《当前革命的组织任务》一文制定从学生小组到党的雏形整个参考计划的用意仅仅是充分提出使地方小组迅速地政治化的诉求，摆脱掉方向上的迷失以此对抗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

在小组方面，这一时期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时期一样需要整合统一起各地组织的思想和理论。但是现在的整合与当年的整合之间的区别，往往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这也一方面导致了一些的朋友们对政治报“路线”的盲目崇拜。

当年与现在的整合

现在的整合，如果说谈的是在直接追求工业化语境下“把各地小组的[革命工作]统一地[组织]起来”，那就

属于把中国革命客观状况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时期相混淆。各个地方小组基本没有展开过与群众接轨的，在圈层之外的革命工作，要么停留在圈内报刊的编写传播，要么停留在工厂中启发几个工人，抛弃组织建设.....这些朋友都算是左圈最内层的人物了。而列宁提出政治报计划的时候，各个地方小组已经经过了“第一时期”与“第二时期”的发展，具备了介入群众运动的条件。换句话说，这些小组已经政治化起来了，但是他们对把自己培养成“强有力的地方组织”的诉求还是非常强烈。这些地方小组受俄国左翼知识界整体的影响（经济主义泛滥），普遍地存在工作停滞甚至倒退的迹象，但同时它们又没有丧失介入到群众中工作的条件，通过革命的组织思想引领，这些组织是能较快地把各个革命工作集中起来，逐步聚集在共同的机构下，直接地为建党打下思想与组织基础的。

「进行这种宣传鼓动.....而在目前，在最广大的居民阶层已经对政治、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兴趣时，这更是特别迫切的任务」，试问现在最广大居民阶层真的对政治、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兴趣吗？不。信息茧房还是牵制着广大群众，试问你周边的人中，大多数抱着政治冷淡态度，还是抱着对社会主义、修正主义感兴趣的讨论态度呢？工人们呢？答案显而易见。

「我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已经在工人阶级中间激起进行“经济”揭露，即对工厂进行揭露的热情。我们还应当再前进一步，在一切稍有觉悟的人民阶层中激起进行政治揭露的热情」，这是列宁在写《怎么办》之前的 1901 年中写下的。现在的我们有在各个方面迈出第一步吗？真正的革命派盼望着组织起工人，一方面讲是为了从介入，到领导工人运动。“组织”，而不丧失“运动”！造反革命社中的无耻叛徒还声称在现有群众运动中散发传单、确保背后具备组织力量下特定的革命者带头高喊口号（这些都是介入现有工人运动的有效手段）是“盲目追求政治影响力”（难道我们不追求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追求资产阶级政治影响力？！）、“冲塔行为”（说得非常好，马恩列斯毛贡都十分擅长你们口中的冲塔）。这些如邓小平般口吐芬芳的新尾巴主义者是永远也无法理解什么叫工人工作，什么叫领导群众的。在理论上顽固不化的马克思主义兴趣社团组织的“融工”，几乎称不上革命的工人工作，他们在计划上碰壁，打算一直成为工人运动的尾巴，甚至并未抱着建立反对工厂的工人组织而长期停滞在低效启发工人（尽管也有所谓组织融工，但效果几乎和个人融工一样），“建立广泛的革命家组织”只成了随手拿来补充的证明自身革

命性的符号。列宁在当时指出“我们的运动的缺点首先就在于自己的分散性，在于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几乎完全陷入纯粹地方性的工作中”，而现在我们几乎没有展开任何地方性的工作！

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几乎没有经历过纲领与理论产生和巩固的时期，更没有组织起力量介入群众运动，也不具备它的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下，显然我们也需要整合，但这里的整合不是在共同的某一机构下逐步合并（左翼大团结与立即照搬政治报计划），更不是在逐步合并的同时，“立即着手”（建立在已具备介入运动的条件之上的）“群众工作”，而是将新的组织建设出发原则重申，将中国左翼实践的反思扩大到各个地方组织，使地方组织共同地暂且迈进一步，使理论与纲领产生并得到巩固，跳出中国革命小组的时间闭环，以此为基础政治化并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当然还有建立长期的互相联系。

传统报刊与电子报刊

在接下来的论述前，先让我们花费篇幅谈一谈报刊本身。报刊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传统报刊（纸质和线

下宣发是其特点)，第二种是电子报刊。

传统报刊的编辑部集中在地方上，和它有直接关联的整个报刊体系中，有这些元素通常是不可或缺的：编辑人员、通常分布广泛的卖报者/分发送员网络、纸张及其供应关系、编辑人员地方上集中起来的交流探讨，整合观点、编辑部编写人员与配送者的密切联系。我们将这些元素整理，总结传统报刊所依赖的为：编辑部-派送员网的地方性架构。实际上还有它广泛的受众群体.....在今天又有多少人长期坚持阅读时不时更新的 pdf 文件呢？

电子报刊，它通常是这些特定的 pdf 文件，其“报刊”的名头被保留着，这种保留究其根本，能追溯到上世纪纸质报刊时期的历史。

电子报刊不可或缺的元素是：电子报刊的编辑人员（可以集中在地方，也可以离散在全国各地）、与前者紧密联系的网络传播者（网站技术人员、到社交媒体分享报刊信息及文件[我们称之为电子报刊的一次传播]的人等等，他们“天生”就不急着需要传统报刊配送人员那样不得不地组成一种相互联系密切的网络，因为互联网已经提供了极其发达的二次传播架构）、互联网提供的，建立在各种媒体平台上的二次传播架

构。

电子报刊编辑部对报刊广泛传播的诉求没有传统报刊强烈，他们对网络一次传播人员的需求不是像传统报刊编辑部对线下派送员那样“越多越好”。传统报刊可以配送到地方的学校、居民小区、工厂、剧院，可以四处邮递。依靠地方上发达的派送员网络，它可以“到居民的一切阶级阶层中去”。而电子报刊的受众通常局限于互联网的小圈子。要破除圈子之前的隔阂几乎依赖偶然性。

可以看到，传统报刊整个体系都具备了使相关人员集中起来、在地方上不断扩大影响力的条件，它为建立一个深入到群众运动中斗争的党，提供了最基础的地基的一部分----编辑部-派送员网架构，这是被寄予建党厚望的编辑人员离散在各地的电子报刊永远也不能克服的缺陷。

“全俄”政治报“计划”在当年

----是唯一的、不得不采取的将政治不满与反抗因素聚集起来，壮大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的手段。

“政治报”（其实是政治报架构）在当时能给各个地方小组提供“共同的任务”（实际是政治报架构建立巩固与再生产），从而统一起各个地方小组的革命工作及思想理论，但是这个语境下的政治报必须和现在的电子报刊严格地划分开来。这里所说的政治报实为一种传统的，政治化的报刊体系，编辑部-派送员网架构与广大的报刊受众群体共同组成了这一体系。

《火星报》在当时被秘密派送到各处：《火星报》派送员利用一切机会分发报纸以及《火星报》的传单。不仅在工厂散发，还散发到街道、剧院、军营，或四处邮递。在大城市，《火星报》遍布街道或剧院的阳台。在清晨亦或深夜时，分发到工厂的庭院中和水泵附近，以便早上的工人可以看到他们。在每次这种被称之为“播种”的操作之后，在附近的一堵墙上会做一个特别的标记，以便在早上看到夜间“播种”的影响。在小城镇和村庄，《火星报》的小册子会在赶集时放入农家车中，并在时机得当时粘贴到墙上。这些都是十分危险的工作，被发现就意味着存在立即逮捕和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可能性。

列宁的灌输论也在这里指导了《火星报》革命的行动。“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

种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进去”，“在工人与厂主的关系外面灌输给工人”。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指明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而政治报刊《火星报》本身坚决斗争的理论正是不屈从于自发性，并且使自发性受其支配的，这为上面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述成立提供了前提。在实际的报刊发放、思想传播和灌输行动上，这种真正革命的理论做到了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

也就在这同时，各个地方组织的同志们也受到了《火星报》的影响，对《火星报》提出的政治报产生了共识。在此基础上，编辑部-派送员网（后可形成代办员网）架构量子化地扩大。之所以是量子化，因为这种架构每次扩大都是一个个单位量累加的，是把从新地方组织提取并加工出的部分架构不断吸纳进现有编辑部-派送员网架构（这时候应为不断建立和巩固代办员网），此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地方组织依靠政治报体系被整合，团结在《火星报》建党斗争的旗帜下。很明显，传统报刊体系起到了建党地基中的地基之作用。

注意，之所以说地方组织的架构“被提取出一部分

并加工”，首先是因为地方组织的核心受《火星报》影响，在计划上接受了“创办“政治报，思想上达成了反对经济主义、对工人进行政治揭露等等的共识，但仅仅这样还不够，在这些接受《火星报》提出的计划及革命工作要求的地方组织内，它们抽出一部分精力更加注重《火星报》提出的要求，为之更改了一部分（占主要地位的）组织架构：它们将抽出人手做配送报刊、工人工作，并令这些同志们与其他认同《火星报》地方组织的代办员们联系起来，组成网络；政治报的共同编写、发放任务也被置于了地方性的新编辑部-派送员网架构中。

如果我们从字面上理解列宁在《从何着手》中提出的“假如我们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办共同的报纸，那么，这样的工作不仅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能干的宣传员，而且可以培养和造就出最有才干的组织者，最有才能的党的政治领袖，这些领袖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提出进行决战的口号并且领导这个决战”，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集中力量“创办”报纸，对应的实际行动是建立与巩固、再生产政治报架构，而不是造反革命社的天才们想的“共同的工作”，如剪辑视频、网络招人、报刊排版等等，又或是共同写作及阅读讨论政治报刊。是的，我们知道，建立或者加工这种架构当

然依赖你们所说的“共同的工作”，但你们把共同工作强行直接当作“脚手架”的内涵无疑是列宁主义的再一次曲解。某种被从地方工作当中抽出的集体的工作，在被置于一种存在地理分散的工作者集团（组织）的客观环境下，各个地方组织能够越发在总体行动上趋于统一，同时使自身更加政治化的原因，仅仅只是出于进行了“共同的工作”本身吗？“共同的工作”和这种整合、集中之间的直接联系及原理是什么？（笔者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你们意图在列宁论述中提取关系相连的关键词：脚手架、共同工作，用自己的语感和惯性思维主导将两者套上了荒谬的“逻辑”关系……根本就没有对列宁提出的“共同工作”做科学的理论解释和分析。

造反革命社又不知何人，竟还如此肆意妄为地说：“组织建设必须在真正的工作和斗争中成长起来（到这里还是对的--笔者注），尤其是政治报路线下共同的写作工作下“

你们在这里陷入了自己提出的观点产生了两种千差万别释义的局面：你们之前的意思是：共同工作是分散在各地小组成员做共同政治报工作，以此“整合”现在的各地小组，现在又把政治报的共同工作赋予在了

单位组织层面的意义之下，完全和前面提出的整合统一（南辕北辙）经过写作中的思想斗争，路线斗争，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发展出适应工作的制度（笔者注：这样一来，制度的“发展”跟在了盲目的实际工作尾巴后面，它仅仅作为了单位组织的一种适应当下工作的固定形式。一个组织，先有制度，有总体方向，才具备组织层面工作的条件，实际组织工作是被领先在前的组织计划和纲领规范着的。列宁提出政治报计划是被各个地方组织接受并实施而不是相反，各地组织自动从实际工作中发展出了列宁的计划及制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布尔什维克主义趋势的实际诞生发生在1903年7月至8月举行的第二次党代会上。大会正充分探讨了党的诸多原则，明晰了党的性质。而实际工作在先的盲动“组织”甚至都不能称之为组织，只能说松散的工作人员聚集体），我们根据客观条件和经验将制度理论化、制度化（根据前文，显然他们所谓“制度的制度化”就能构成他们所说的组织建设——笔者注）”

《造反周刊》的“政治报路线”的阴霾下“共同工作”被空洞论述，他们将政治报体系崇拜成组织建设的真谛（很好，实际建设组织的要求就是实际建设组织本身），引入某种指导实践的废话去掩饰掉列宁政治报

计划的锋芒，阉割掉政治报架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对他们来说都几乎只留下了（依托网络）共同的写作，将政治报体系庸俗化到了什么也不是的地位。

“全俄政治报计划是一个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同时又丝毫不忘记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计划”，列宁说。当时的迫切工作是什么？就是建立与巩固、再生产政治报架构，在这项工作里细分，既有实际地方代办员深入群众展开的揭露，又有对各个地方小组的整合，统一思想战胜经济主义、在工人当中进行政治揭露等等。建立、加工政治报架构可以“追溯”到革命工作的各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列宁的灌输论直接地贯穿在了政治报计划中。正是这样，各个地方的运动才能被整合成全俄的运动（《从何着手》），俄国社会民主党第四时期的大门才被迅速打开。

现实与未来

如今，我们能否学习《火星报》的一整套报刊-群众工作思路：在海外各个国家印刷后，经过极其迂回

的路线，到达俄罗斯境内《火星报》秘密委员会.....

也许可以？

最受欢迎的媒体还是传统报刊吗？

显然不是。

如今，还存在我们自己的传统报刊配送员吗？我们还能聚集起地方代办员吗？

不存在配送员。

火星报时期按政治报计划，各地小组聚合起来能迅速摆脱社民党的第三时期建党，而且当时已存在一些发达的火星报地下派送员网络。这直接为建党提供了组织基础。而现在我们在代办员网还并未存在的情况下，聚拢起还未成熟的组织架构，带来的是一个极其容易被一举击溃的软塌塌的聚合体。

除此之外，当今中国左翼的电子报刊体系因其固有缺陷（去中心化、对地方派送员无必须的要求），无法聚集起地方的代办员网络，当时政治报（体系）是唯一工业化组织手段的名号显然不能落到电子报刊头上。

现在中国左圈的最内层已经有一部分朋友们加入到社群频道，加入到网络上的时事评论发布组织、人员

离散的电子报刊编辑部中，他们秘密撰写并发表文章……这些时事评论、电子报刊的传播难以打破文化圈子的壁垒，本身也没有聚集起人、使一个整体走向革命的必须的要求。许多左翼最内层具备最基本理论知识的朋友，沉迷于写电子报刊文章，在网络输出自己那对历史遗产的争论，殊不知左翼就在自己对组织起来革命的冷感中，在生活与革命的割裂中一步步加深它的圈层化，这是十分可怕的。

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寻找当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如果没有，那么就建立。在此过程中与周边各个地方小组建立联系，在交流中产生各个方面的共识，并且协作开始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使地方组织政治化起来。至于是否能找到可替代传统政治报体系作用的东西，现在考虑为时尚早，但为了使我们不迷失方向，坚持将一切革命化，我们一直需要寻找它。

红影

附：列宁《怎么办》“结束语”章节

结束语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时

期。

第一个时期包括大约十年，大致是 1884-1894 年。这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纲领产生和巩固的时期。当时俄国拥护新派别的人还寥寥无几。社会民主党是在没有工人运动的条件下存在的，它作为一个政党当时还处在胚胎发育的过程中。

第二个时期包括三四年，即 1894-1898 年。这时，社会民主党已经是作为社会运动，作为人民群众的高潮，作为政党出现了。这是它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知识分子普遍地热衷于反民粹派的斗争，纷纷到工人中去，工人普遍地热衷于罢工，这就像流行病迅速蔓延一样。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多数领导者都是些很年轻的人，远远不到尼·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认为是一种天然界限的那个“三十五岁的年纪”。因为年轻，他们对实际工作缺乏修养，很快就退出了舞台。但他们的工作范围大都是很广的。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开始具有革命思想，是同民意党人一样的。他们在青春早期，差不多全都热烈地崇拜过从事恐怖活动的英雄。当时要抛弃这种英雄传统的令人神往的印象，必须进行斗争，而且必须同那些始终忠于“民意党”而深受年轻的社会民主党人敬重的人决裂。斗争

迫使人们学习，阅读各种派别的秘密著作，努力研究合法的民粹主义的问题。在这个斗争中训练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到工人运动中去，他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启发他们的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推翻专制制度的任务。1898 年春党的成立，是这一时期社会民主党人所做的最突出的、同时也是最后的一件事情。

第三个时期(1898-?)，我们已经看到，是在 1897 年就开始准备的，而在 1898 年完全代替了第二个时期。这是混乱、瓦解和动摇的时期。人在少年时期，嗓子要发生变化。同样，俄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时期，嗓子也发生了变化，它发出一种假嗓，这种假嗓一方面出自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布尔加柯夫和别尔嘉耶夫等先生的著作，另一方面出自弗·伊-申和尔·姆、波·克里切夫斯基和马尔丁诺夫的著作。但是向四面走散和向后退却的只是领导者，而运动本身还是继续发展，大步向前迈进。无产阶级的斗争把愈来愈多的工人阶层卷进来了，并且扩展到整个俄国，同时，又间接地促使学生以及其他居民阶层中的民主精神活跃起来。但是领导者的自觉性却在广泛的强大的自发高潮面前屈服了；这时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占优势的已经是另外一批活动家，他们几乎纯粹是靠“合

法”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培养出来的，而群众的自发性要求他们具备的自觉性愈高，这样的书刊也就愈显得不足。领导者不仅在理论方面（“批评自由”）和实践方面（“手工业方式”）都落在后面，并且还企图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落后辩护。社会民主主义被合法书刊上的布伦坦诺派和秘密书刊上的尾巴主义者降低为工联主义。《信条》纲领开始实现，特别是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手工业方式”使那些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活跃起来的时候。

因此，假使读者责备我把一个《工人事业》谈得太详细了，那我就要回答说，《工人事业》所以具有“历史”意义，是因为它本身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第三个时期的“精神”。[原注 62] 真正能够代表混乱和动摇以及无论对“批评”、对“经济主义”或者对恐怖主义都准备让步的，并不是始终一贯的尔·姆；而正是随风转舵的克里切夫斯基之流和马尔丁诺夫之流。这个时期的特点并不是什么“绝对原则”的崇拜者傲然轻视实践，而是狭隘的实际主义同完全不关心理论的态度相结合。这个时期的英雄们所干的事情，与其说是直接否认“伟大的字眼”，不如说是把它们庸俗化：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完整的革命理论，而变成了人们“自由地”把各种德国新教科书里的液体掺进去的大杂

烺；“阶级斗争”的口号不是推动人们向前去从事日益广泛、日益有力的活动，却成了安慰人心的手段，因为据说“经济斗争是同政治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政党的观念不是号召人们去建立战斗的革命家组织，而是去替某种“革命的文牍主义”和玩弄“民主”形式的儿戏作辩护。

第三个时期什么时候完结，第四个时期什么时候开始（不管怎样，现在已经有许多征兆预示着它的到来），我们还不知道。这里我们已经从历史的领域转入现在的、一部分是将来的领域。但是我们坚信，第四个时期一定会使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巩固起来，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渡过危机而变得更加坚强和更加壮大，机会主义者的后卫队一定会被最革命的阶级的真正的先进部队所“代替”。

作为实现这种“代替”的号召，同时也为了把上述一切加以归纳，我们对于“怎么办？”这个问题，可以作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

结束第三个时期。

载于 1902 年 4月1日《火星报》第 19 号

当前革命的组织任务

“可是现在要求我们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要求我们不仅懂得需要有什么样的组织来进行什么样的工作，而且要制定出一定的组织计划，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组织”

——列宁《从何着手？》

序言：建立组织运动的时间闭环和计划的提出原因
目前中国的绝大多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都是高中生或大学生组织。

这种学生组织具有以下几点性质。

1. 松散社团形式
2. 指导组织的意识形态教条化与形而上学，甚至成了文化符号。
3. 学生小组普遍陷入集合—自发进展—衰落的时间闭环，小组工作自发进展，丧失计划。

第三点很大程度受到小资产阶级“融工建党论”的影响
(融工建党论以对革命左翼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一员的渴求，将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一方向置于次要地位，借着建立先锋队旗号阻碍无产阶级政党的建

设)。产生这一影响的客观条件是城市的中产阶层化使中产阶层家庭背景的学生（也可说左翼学生）和无产阶级直接地隔离的社会关系（经济方面没有隔离），以及列宁指出的在情绪上和思想上与无产阶级存在某种对抗。

同时，第三点是最为致命、对于发展革命的组织来讲也是最重要的。克服这问题，前面两点也可以解决。

关于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列宁在怎么办中进行了阐述。

> “这个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其他地方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联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根本没有一个较为长期而有步骤的活动计划，就去同工人建立联系，着手工作起来.....通常是这种行动（指学生小组的军事行动——本文作者注）一开始，立刻就会遭到彻底的失败。其所以会立刻遭到彻底的失败，是因为这些军事行动并不是有步骤的、事先考虑好的和逐步准备的一种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的结果，而只是按老一套进行的那种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

丧失了列宁所描述的计划，学生小组的组织工作就会

自发进展。必须反对这种自发进展，因为现在的专制制度下学生一开展较大规模或明显反对政府专制的，公开和秘密的革命活动，基本还是会被当局打击。青岛六十七中马克思主义学会、北马，甚至改良主义的南京反卷联盟、理想组等等的解散就是例子。之所以失败，正如列宁所说，革命的学生小组缺乏一个长期的、有步骤的活动计划，小组工作就倒向了自发进展。这样屈从自发性的学生小组往往不能长久存在，停滞于松散的社团形式，通常会形成少数领导核心一方的寡头政治，领导人也一般出于心血来潮开展临时性的领导工作。

中国兴起了一大批中产阶层，革命左翼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左翼学生----他们家庭社会地位的延伸）中，极少有带头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或仅仅是名义上的）组织。这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承认马列毛主义，但仍与无产阶级存在阶级的社会的对抗，在思想上和情绪上与无产者有冲突，他们对组织起来的需求也没有工人强烈。另外这也表明：他们承认的马列毛主义被曲解，形成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碎片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尽管他们那所谓的“马列毛主义”也声称“投入实践！”“融入工人！”，但这往往就沦为了一种证明他们

与群众对立，形成了封闭的社会圈子的符号——他们不仅根本就没有实际拟订长期的革命路线的计划，而且把马列毛主义看作割裂相对性的绝对真理，并且通常截取了这一革命的意识形态的碎片将其包装成教条（如借思想改造的名义将反对二次元上纲上线），或把马克思主义加工成文化符号。

正如十一月评论所说：

> “革命的理论 and 行动永远是处于具体的总体社会关系中才有可能的，如果只是对自己身边的“社会”进行片面的分析与批判，不是走到孤立的真理观，就是在工人阶级的“政治冷感”中幻灭，亦或仅仅热衷于局部的改良。与工人阶级的实际接触并不是简单地把民意党人的“到人民中去”改成“到工人中去”，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道德化的幻想只是善恶二元论的另一形式，事实上，这一论断本身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容易遭遇的魔鬼”。

《我们的组织任务》当中，杜临指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当前的普遍问题——内部圈层化：

> “.....更重大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圈层化的加深。更加老练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是无法同新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直接联系，就是由于缺乏组织，根本没有成建制接触的可能。时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

内部具有不同的形式：自 2019 年以来，不是十几年产生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几乎一年就可以产生好几代互相隔绝的信仰者；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只能根据既存社会结构和自己能接触到的文化圈子和知识结构，从头开始发展自己的见解。自 2019 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是逐代提升，而是在它的每一代信仰者那里陷入重建和发展的循环。”

当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是极其缓慢的，同时是陷入“集合—自发进展—衰落”的时间闭环的。每一个组织的衰落都不会带来马列毛左翼意识形态上革命的进步，新的知识分子的、社团形式的集合与自发进展也建立在丧失一个革命的长期计划的基础上。

如杜临所说：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的作用之一正是累积理论和政治经历，使革命意识跳出可悲的时间循环。要么不愿成为革命者的预备队，要么没有能力有效地从事这种工作，这就是以往的团体和目前的团体失败和必将失败的原因”

而理论和政治经历的积累恰恰要求组织建立一个长期的、考虑到自身的长远发展的计划！

列宁指出：

> “二三月事件的教训是很深刻的，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在原则上反对这种结论了。可是现在要求我们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要求我们不仅懂得需要有什么样的组织来进行什么样的工作，而且要制定出一定的组织计划，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组织”

为了反对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我们需要在小组架构重组的过程中提出制定具体什么样的，持久、有步骤、坚决战斗的学生小组计划呢？是时候把老调再重谈了。

一、重新审视组织成员间的、成员和领导层的关系，建立有机的组织关系

新的有机的组织关系是提出计划并取得同志们的认可的基础。

> “一些团体和组织认识到了缺乏有机关系和一致意见的重要性，试图通过几份纸面纲领来规定自身。然而，这些纲领只是发出关于组织制度的长篇大论，不是完全没有研究过现实问题，就是用一句话草草地把共识一笔带过。再完美的制度也无法弥补有机关系的

缺乏”。

另一方面，现在左翼学生组织领导人或者领导层的形成往往是出于他们对组织实践方面的贡献，或者理论水平甚至学位成绩，博得组织成员的敬仰。然而这种关系是单方面的、机械的，也就不是有机的。

> “领导不是也不能是被强加上来的，成员对领导的追随来自双方的交互和真正代表关系，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

有机关系在组织事务生活化、在反对错误思潮的斗争与不断的自我批评、对组织基础和组织建立的反思当中确立。

1. 组织事务生活化，意味着我们不能把个人的生活看作独立于革命事业的存在。相反，个人生活与组织事务必须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组织任务》的第二章已经用列宁的例子具体描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时刻地参与和同志之间对组织发展方向的策划，参与和同志间共识的培养，参与到比如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讨论、对组织给成员的长期工作任务之准备的讨论上，完全的、不脱离日常生活的去考虑自己每一个行动，规划日程。这样组织事务不仅映射到日常生活，革命者的日常生活事务也高度依据组织事务的需求而执行。

2. 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各种当前“革命组织”的机会主义思潮，以及在组织内部同错误观点的斗争，甚至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建立并巩固有机的组织关系。

这里主要谈后者。

很多人一顺着组织内部潜在的盲目信任关系的破裂，隐约看到组织潜在的分裂后，就充当“大好人”的角色讲“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大道理。

> “取得同志间的有机关系必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推进的过程中难免遭遇分歧甚至分裂。原本以散漫社交关系为存在形式的团体有可能在建立有机关系的过程中完全撕裂开来，这就是为什么以往的和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团体都无法或不敢提出严肃地建立组织的任务。”

“一种强烈依赖少数个人方能运作的组织模式本身是不健康的，即使它在团体初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杜临这样指出。

为了进“建立有机的组织关系”这步，我们必须退两步——第一步是重新审视现有的学生小组成员间和成员与领导层间关系，进行组织架构和成员关系的重组。第二步是，如果多次与成员协商，达成建立新的组织关系这一共识无果后，为了保证建立一个为组织的进步提供基础的客观条件——有机的组织关系，我们只

能分裂出这些思想落后的成员。这是为了进一步。

正如《关于组织生活的几点讨论》里所说：

> 组织拜物教的信徒和不明事理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把毛泽东的这几句话挂在嘴边：“要把朋友搞得多的”

>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意思是说，他们认为一切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并反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人都要团结在同一个组织里，要给致力于政治斗争的人扣上一顶“分裂者”的大帽子。然而毛泽东还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者绝无可能把商品拜物教视为自己的朋友，对组织拜物教的态度也应保持一致。

二、计划的提出和坚持

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在被改善的有机组织关系建立基础上的，体现出一条完整、精确的方向的计划。这条方向直指人民战争的发动，而计划则囊括着：立足于学生小组，建立列宁式先锋队，夺取工厂，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人民战争.....

只有这样一条鲜明体现马列毛主义者战斗需求的计划，一条清晰无比的，立足于现有组织现状和有机关系，长期的组织计划，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才能得到

克服，小组才具备向革命发展的条件之一。

当然，现在谈建党为时尚早（这是从组织的辩证发展角度来看的），但是我们需要一个组织思想骨干。没有这样一个具体行动的骨干，政治化也的确容易被地方小组的同志们理解为“空谈”，组织发展还是难免会像融工派那样一进厂就碰壁停止。因此我们认为还是需要构想一个长期的参考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

方向上基本的政治共识之确立先于组织计划的制定。建立组织计划是在组织成员在基本的、长期的小组发展方向上有认同的基础上开展的。下面指出一些基本的（学生）组织发展方向。

1. 马克思主义小组必须向着重建军事化的共产党发展，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组织发展方向，在这个方向上总结革命实践经验发展军事理论。军事化对于一些实际的机会主义者来说是最致命的。他们恶毒的借着文化上碎片而不成体系的“反对主要是毛主义”态度趁机取消党的军事化建设，实际上暴露了他们抛弃武装斗争，渴望“融入工人”后，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就能等同于先锋队的自觉性（工人的行动，即便你不去影响，它也会自己发生；即便你再怎么影响，它也会有超出你影响的部分，遵循自身的逻辑在发展。因为工人是自在的阶级，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有影响

没影响，有组织没组织，有你没你，它都照常生活、照常行动。所有阶级和它的自觉集中部分、和它的先进部队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幻想着通过全国性统一的、非武装形式的阶级运动停摆政府，从而夺取政权的融工建党论（实际上含有托洛茨基主义“发展无产阶级的主动精神”的衍伸或者变种成分），或者一条停滞在地下形式夺取工厂的死胡同“路线”，实际倒向了军事主义，认为创造历史的是武器，而不是人民。为了坚决地和机会主义划清界限并做斗争，我们必须提出重建军事化的共产党，对建党的军事化需求做强调。

早在列宁的《从何着手》一文中在反对一些革命派局限于恐怖手段的论述当中表明，军事行动必须同革命组织的整个战斗部署高度适应，并且军事力量应该由组织统一起来：

> “.....恐怖手段，并不是作为作战军队的一种行动，一种同整个战斗部署密切联系和相适应的行动，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同任何军队无关的单独进攻的手段。的确，在没有中央革命组织而地方革命组织又软弱无力的情况下，恐怖行动也只能是这样。”

这从反面应证了前面的论点；同时列宁又说：

> “我们党的直接任务，不能是号召现有的一切力量

马上去举行攻击，而应当是号召建立革命组织，这一组织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能够统一一切力量，领导运动，即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抗议和一切发动，并以此来扩大和巩固可供决战之用的军事力量”。

毛泽东“党指挥枪”的军事化政党原则就是列宁提出这样的军事化需求后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

> “战斗队的人数不限，两三个人也行。“战斗队应当自己武装起来，谁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枪、左轮手枪、炸弹、刀、铁拳套、棍棒、纵火用的浸了煤油的布片、绳或绳梯、构筑街垒用的铁锹、炸药盒，有刺铁丝、钉子（对付骑兵用）及其他等等）。无论如何不要等待来自旁处、上面、外部的帮助，一切都要靠自己弄到……即使没有武器，战斗队也能起极其重大的作用：（1）领导群众；（2）在有利的场合袭击巡警，袭击偶然掉队的哥萨克（在莫斯科曾发生过）等等，并夺取武器；（3）在警察少的时候去营救被捕的人或受伤的人；（4）爬上屋顶、楼房上层等处，从那里向军队扔石块，泼开水等等。一支有组织的紧密团结的战斗队只要奋发起来，就是巨大的力量。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借口缺少武器而拒绝组织战斗队或者推迟组织战斗队”

> 在 1905 年革命期间，列宁就事实上提出了党的军事化原则。1906 年的著作《游击战争》强调“在国内战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就是要成为战斗的党。”在 1917-1921 年国内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党起到了轴心的作用，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元化领导。1920 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

《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指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必然要变为国内战争，其目的是夺取政权……这种阶级斗争要求把各种各样的无产阶级运动形式（工会、合作社、工厂委员会、文化教育工作、选举等等）联合在一个核心的周围，并对其实行总的领导。这种共同的起联合和领导作用的核心，只能是政党。”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提出了“党指挥枪”和“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并论述了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个法宝的互相关系。这表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实际上也归功于党的军事化和同心建设，只是当时的革命者尚未对此做出全面的总结。

不理解军事化的朋友把列宁提出的“战斗的党”中“战斗”单单理解成割裂开军事斗争的政治斗争，实际上从列宁对战斗队及其相关的描述就足以表明，“战斗”的涵义是以军事斗争，展开军事行动作为着重点的。

再摘录列宁的下面这段作为补充。

>那些同工人建立并保持联系和印发过传单的人，现在已在同其他革命家团体建立联系，设法取得书刊，着手出版地方报纸，开始讲到举行游行示威，最后转向公开的军事行动（而且第一张鼓动传单、第一号报纸或者第一次游行示威，在不同情况下，都可以成为这种公开的军事行动）

可以看到军事行动绝对不是和政治斗争相割裂的。政治斗争的行动可以成为军事行动。军事化的意义也绝对不仅限于“拿刀枪武装”的同时把党像军队一样运作。

> 贡萨罗在准备发动人民战争时指出了军事化的含义，“以党为一切的轴心，围绕党建立军队，依靠三大工具（党、人民军队、统一战线），依赖人民战争中的群众，以三大工具为中心，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军事化不是只进行军事行动，而是党以军事斗争为中心，把军事斗争作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军事化只能通过具体的阶级斗争、军事斗争进行。

2. 人民战争发动之前，一切行动必须为其发动服务；全面彻底的粉碎帝国主义国家机器的唯一途径就是人民战争，其具有普遍适用性。

列宁说：

> “西欧的经验已经证明常备军是十分反动的。军事科学已经证明民兵制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民兵无论在防御战或者进攻战中都能够胜任地完成军事任务。让假仁假义的或者多情善感的资产阶级去幻想废除武装吧。当世界上还存在着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时候，我们必须争取的不是废除武装，而是全民武装。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充分保障自由。只有全民武装才能彻底打倒反动势力。只有在实现这种改革的条件下，千百万劳动者才能真正享有自由，而不是一小撮剥削者独自享受自由”。

> 1895 年，恩格斯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马克思的《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序言中说，那种“斗争方法”，那种“旧式的起义”，已经过时得令人绝望了。但是恩格斯并没有下结论说武装斗争本身失败了，而是试图在变化的条件下找到新的斗争方法：“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 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 1848 年

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 1870 年 9 月 4 日和 10 月 31 日在巴黎那样，自然是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

恩格斯所说的更大的力量这一需求，就是人民战争的需求。

>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 如何理解人民战争的一般有效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在不同类型的革命和相应的特殊条件下应用这一理论，是个关键而有决定性的问题。要明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到：在彼得格勒起义、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或二战时在欧洲的游击战，这些例子没有原样重现过。最后，十月革命不仅是一次暴动，也是一次持续数年的革命战争。因此，在帝国主义国家只有通过革命战争——在今天来说也就是人民战争——才能实

现革命目标。“作为总结，今天更甚以往的是，我们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无产阶级和人民，需要依此宣誓：‘我们宣誓，将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坚持革命战争的战无不胜的理论。’即，坚持战无不胜的人民战争理论。”——秘鲁共产党《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

在《人民战争—解放的唯一途径》中，《阶级立场》对发达帝国主义国家人民战争的开展做了系统性分析，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武装夺取城市政权的可行性做出了肯定结论。

我们应该时刻依据人民战争发动前最重大的目标——发动人民战争，并以它为目标制定长期的，坚决斗争的组织计划，这一计划也必定是包括重建军事化共产党并以它为方向的。

明确以上两个方向后我们再仔细理清知识分子团体发展成职业革命家组织的路径，制定一个较为详细的持久计划。

在论述之前，我们重谈列宁对当时学生小组提出的政治化需求。

列宁说：

> “当时的青年学生普遍倾心于马克思主义。自然，他们这样倾心并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理

论，甚至与其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理论，不如说是把它当作对于“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回答，当作向敌人进攻的号召。于是，这些新战士就在装备和训练极差的情况下进军了。在很多场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丝毫训练。他们像种地的庄稼汉那样，只操起一根木棒就去作战。这个学生小组同运动中的老的活动家们毫无联系，同其他地方的甚至本城其他地区（或其他学校）的小组也毫无联系，丝毫没有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根本没有一个较为长期而有步骤的活动计划，就去同工人建立联系，着手工作起来。”

可以看到，关键点不仅在计划的建立和坚持，还在“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工人工作之前或者过程中需要先从组织自身的发展原则出发制定和更新计划，而不是遵循盲动的、无自身组织发展原则、无职业革命家的集中原则的托洛茨基主义延伸和变种（融工建党论）。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以组织建设为中心，不能一切工作为组织的发展而服务，但也不能陷入不从自身组织的发展原则出发制定盲目的纲领或计划，很典型的例子是小资产阶级融工路线。

很多组织的小资产阶级融工路线都有这么一个相同

之处：号召所有学生小组（不论松散程度，可现有绝大部分学生小组要么内部和兴趣社团毫无区别，要么上级领导包办一切）集体进厂培养工人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灌输给工人，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然后路线就碰壁一般停了。

这种路线是把自身组织的实际情况理想化了，这样的融工派们在制定路线和计划的时候把自身组织默认成了：随不同阶段纲领内容而跳级的，自动变化客观情况的组织。当学生组织还没形成的时候，他们说不支持个人融工，先发展学生小组。当先锋队还没建立的时候，他们潜在地幻想出了一个已经拥有很多地方党小组、集中形成了职业革命家圈子的无产阶级政党雏形出来，以配合他们“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这个说法。当先锋队诞生的时候，他们再次跳级地幻想出了一个可以发动工人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党。这种融工思路的错误就在于没有从自身组织建设与发展的原则出发制定纲领计划，和托洛茨基关于群众运动高潮时期突然出现的，领导群众的“核心”一说极度一致。

为了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作为一个革命小组，其纲领路线计划的制定必须从自身组织发展、建设原则出发。

再次注意：现在谈论建党的目的仅仅是不迷失方向！

我们的计划

准备工作：

必须审视到小组还是一个学生兴趣社团，只有这个团体保持延续性和一定程度的稳定，才能谈后面的发展。

第一，不盲目招人，做一般成员向小组核心的转化工作，然后才是建立学生团体的再生产机制，具体为指定宣传员到下一届、下下届学生当中吸引左派和先进学生，再生产组织。这需要宣传员、整个组织，或者说组织的宣传部，根据宣传情况的反应、讨论，视情况制定灵活的宣传策略，选择合适的宣传材料。

第二，宣传员和宣传部本身也必须并入再生产机制中。必须把加入组织的下几届学生的一部分（他们往往对小组工作十分热情积极，具备最低限度的理论知识）培养成宣传员。

还有重要的第三点，是长期保存小组的长期计划，随着可能的学生团体更迭，随着组织向标准化再生产（去手工业化）的过渡，长期召开全体人员会议或者读书会，培养组织成员在组织发展方面的政治共识，把整个组织计划作为发展的意识形态完全、充分彻底

地指导下几届学生的组织实践。

这也需要全体学生团体的成员长期同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性做斗争，这个斗争立足于整个小组对以下计划的强调，立足于将个人生活完全融入组织生活的过程，立足于革命斗争在日常生活的深入。

依靠计划统一思想。“就像列宁说的，先锋队不需要任何花里胡哨的形式民主，而是依靠内部同志的互信“自然地”得出一个领导，所有人都听从这个领导的指挥，而这个领导又随时保持同成员的健康关系。这种党内的有机关系才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不是某种切实的选举和行政制度，而是对这种关系的表述。为了贯彻这种同志关系，革命者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来统一思想。”（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疑问，杜临在《革命组织和知识分子》以及《我们的组织任务》有解释）

下面是从松散的学生整体到军事化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计划。

a) +自身学生小组重组（前文所说的“进一步，退两步”），在实际工作当中、在讨论中产生出政治共识。
+这时候的组织成员中还有一部分谈不上先进的马列毛主义知识分子，但是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潜能（或者说完全投身于革命事业的精神）在少数知识分子的

行动和思想中逐渐突出体现。

+组织的有机关系纵深化。骨干成员的转化工作：需
要把部分工作转移到对内部成员向小组核心的转化
上。同时也对核心成员的思想和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把小组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如自身组织建设、舆
论宣传、群众工作、武装斗争事务等等）组织起来，
并把它视为组成计划的重要部分，持续地、日常地建
立和更新小组工作细则和任务分配，调整具体的小组
路线。

+筹备组织经费，为后面建立和发展职业革命家奠定
经济来源这一基础，小组需要到一切社会阶级阶层
中，注意接触并视情况（立场、理论等）拉拢激进
的，非学生的马列毛主义知识分子（一般为脑力劳动
无产阶级或城市小资产阶级）（可以视情况做激进地
反对政府的劳动者的思想工作）

+建立组织经费稳定提供者的标准化再生产机制。

b) 地方上发展学生小组（主要是大学生），依靠网
络以及人际关系与周边地区的革命小组进行整合，在
方向、计划上达成一致，并保持密切联系，可以展开
合作比如共同创办政治报。这点和前一点并不是绝对
阶段性的，依据组织情况做调整。

- c) 同本地及周边的其他革命组织取得联系。
- d) 当存在政治化的，建立有比较全面的革命工作各个部分的部门（特别是军事筹备部门和负责组织经费部门）时，在对当地的社会关系有较为全面、且较为浅薄的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依据整个长期的小组计划，可以组织起积极、先进的学生进厂调查和培养工人革命家，同时要有组织做后盾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 e) 在进厂做特殊革命工作（也许就是所谓“融工工作”，但我们反对使用这种称号，离开对社会关系的了解和分析、脱离开组织自身发展原则的“融工”狂热者们往往会自发倾向托洛茨基主义）的过程中，以及在其他部门成员对工人的秘密宣传中，会涌现出先进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应当迫切成为职业革命家，先进工人作为他们做工作的对象，也应当培养成工人革命家，而工人革命家在参与工厂外学生组织分配到工厂的事务中，产生组织认同、愿意将自身事业完全献身革命的同志也迫切地需要成为职业革命家。
- d) 职业革命家圈子的形成，他们之间应该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和共识，有机关系是最为发达的，他们对整个马列毛主义革命小组（也就是工厂外的“学生小组”——显然，此时学生小组已经不能称为学生小组了，它处于政治化的学生小组向党的雏形的过渡时

期)的计划坚决地遵循(深刻理解就更不用说了),具有高度的自觉,他们的每一位都有做整个组织的领导者的能力。

e) 在 d 的另一方面讲: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建立和职业革命家的集中,应当是“学生小组”的领导层(或其中一部分)和职业革命家共同策划,遵循一种真正意义上,不同于组织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建立的(人员如果没有重合一大部分,接下去可能会造成组织暂时的停滞或者分裂,因为其他部门如经济部门、网络宣传部门的整合与协调之前是由“学生小组”领导层非职业革命家的一部分接手的,交接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偏差。当然如果原学生小组的领导层人员全部愿意完全投身革命事业,那是再好不过的),它应当严格区别于原“学生小组”的组织架构,比原“学生小组”更加政治化和军事化,具有更加高的秘密性。这是列宁教导我们的。

“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列宁这么说。的确,职业革命家组织就是这种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

与此同时,原“学生小组”必须整体重组,其各个部门、所有地方组织必须围绕职业革命家组织建立,受

其领导。

列宁这么说：

> 是要供给工人真正的、全面的和生动的政治知识，就需要在一切地方，在一切社会阶层中，在能够了解我国国家机构内幕的各种阵地上都有“自己的人”，即社会民主党人。这样的人不仅在宣传和鼓动方面需要，在组织方面尤其需要。

这个时候，整个“学生组织”在过渡阶段必须和之前和现在接触到、相对可以信任的一切社会各个阶层的组织在坚持秘密与公开结合原则下深入合作，使尽量多的地方马列毛主义学生组织也迅速地政治化起来，并作为自身重建军事化共产党的基础。

f) 同时在各地工厂建立（可以在介入的过程中吸收原本存在的）尽量广泛、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如怠工组织、地下工会、工厂委员会等等），在社会各阶级阶层也介入，尝试吸收一些反对专制的组织，服从职业革命家组织领导。必须建立群众组织的再生产机制以确保建党的基础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稳定和长期存在。

g) 与此同时由职业革命家组织策划持久的，对武装力量的秘密筹备。必须向着拥有能稳定地与警察对抗的武装力量这一方向发展组织，动作必须多加谨慎。

i) 重组后的组织依靠广泛的工人组织以及广泛的政治化的马列毛主义知识分子组织为基础，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向着军事化迈进。为了向军事化迈进，共产党必须围绕自身建立尽可能多的不同层级（依照保密程度而分）的组织，以及依照接触得出的可信任度，同心建设各层级组织（“贡萨罗主席提出的同心建设路线具有普适性，不仅三大工具应当同心建设，一切革命组织也应当同心建设。首先是革命骨干组织，这是职业革命家的核心集团，是军事化共产党的前身和雏形，其次是产生组织，民主集中制的革命群众组织，例如革命学生组织等，再就是一般性群众组织。骨干组织、产生组织和群众组织可以而且应当同心建设，三类组织经过中间的产生组织得以贯彻群众路线，因为像三大工具中的人民军队的支队具有流动性，产生组织也有流动性，实际上形成了列宁建党时期的流动的“代办员体系”。同心建设的组织路线的特征是一元领导、集中统一、群众路线等等，逐步形成共产党重建委员会，过渡到三大工具的同心建设，并加强产生组织的建设。中国革命者的一个创造是以运动的形式开展革命工作，我们建设全国性的革命组织，首先是革命骨干组织，应当通过革命组织改造运动，这场运动包括革命自由软件运动、革命深度学习

运动、革命社会调查运动等等以及组织的许多集体活动，革命者和革命组织在运动中得到无产阶级化的改造，逐步形成巩固的骨干组织)，使整个组织军事化，使每一层组织都具备稳定的，能够持久对抗警察打击的能力（组织层级相关参照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提出的按对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接近程度排的五层组织（同时我们也能明确看出贡萨罗是在列宁的基础上总结出同心建设理论的），在监控系统更加完善的今天需要建立七层、八层组织：“一些组织应该包括在党内，另一些组织不应该包括在党内。在《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已经很明确地提出我在代表大会上所辩护的那个思想。这一点可以具体表述如下。一般按照组织程度，尤其是按照秘密程度来说，各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革命家组织；（2）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我只说到工人阶级，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这里也包括其他阶级中的某些分子）。这两种组织就构成为党。其次，（3）靠近党的工人组织；（4）不靠近党，但是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5）工人阶级中没有参加组织的分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也是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

j) 应对中国政府的监控网络：革命家需要伪装自己

成“普通群众的一员”，秘密在地方集会，成立考察城市监控系统的队伍。这支队伍应该动态地摸清城市当中监控的死角和警力的分布与具体的集中区域，甚至考察地形特点，分别筛选出适合集会、宣传等等的地点。这样的队伍同职业革命家组织没有直接的联系，由下层组织交接情报。考察队伍需要尽量广泛，彼此之间有尽可能安全的网络上的联系，拥有再生产机制。

以上就是从学生小组到军事化共产党的发展 计划 。#a：计划（是反对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的必要条件）、#b：标准化再生产机制（既然党的特征是能够稳定、长期地组织起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那么建立党的过程中就需要时刻以确保组织的延续性和长期稳定当作必要的原则）、#c：真正“民主集中制”的有机关系（“科学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并不是一人一票投来的，而是从艰苦的理论劳动提取出来，经过无数的政治斗争才有可能占上风。它并不能保证自己从一开始就是大多数”“民主集中制的意义就在于同志间的有机关系，失去了它之后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只不过是官僚集中制用旧日荣光所打造的一副皮囊而已。真正的先锋队所倚重的不是一套尽善尽美的组织制度，而是坚决的革命原则加上赤诚的同志关系”），

一个学生小组，只有同时满足上面三项对组织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需求，才能向着重建军事化共产党发展，组织事务才能归根结底服务于人民战争的发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计划的确立后于标准化再生产机制的建立，而再生产机制的建立又包括在整个计划中。第三者有机关系的建立和巩固、向纵深发展，骨干成员转化工作，这些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和再生产机制的建立同时开展。

方向上的初步共识的达成先于用计划指导所有学生成员的组织行动。

重新审视学生小组成员之间的关系，承认组织的客观现状，才能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有机关系。

上述这一切如何在一个松散的，和学生社团没有本质区别的学生团体中得到执行呢？在没有与小组建立直接的联系的情况下，这将可能会高度依赖原本靠威望或者魄力之类因素博得成员敬仰而产生的实际领导人

（或领导层同志）自身在思想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

（这种斗争在外界输入革命的组织建设方针这一客观条件下进行）的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正因为此，我们的一大任务是（在自身小组将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初步统一起来，达成一定政治化后）在地方主动介入这些停留在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上的学生团

体，全面彻底地引导同志们理解革命的组织建设方针，与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性做坚决的斗争，使各个马克思主义学生团体有一个较为统一的，长期的坚决斗争的计划。

在最后，让我们预祝中国革命左翼的学生社团领导者们能够战胜小组工作的自发进展性，接受这份可能在实践中不断修改，但相对当下中国革命左翼现状来说十分值得一试的方针。

预祝持久人民战争的胜利。

2025.10/第一稿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列宁：

·《怎么办》

·《军队和革命》

·《从何着手？》

·《进一步，退两步》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

“阶级立场”：

- 《人民战争——解放的唯一途径》
- 马列毛主义《红旗》编辑委员会：
- 《论中国革命的形势与策略》
- 《论贡萨罗主席的普适性贡献》
- 《呼声》编辑部：
- 《我们的组织任务》
- 《革命组织和知识分子》
- 《十一月评论》编辑部：
- 《关于组织生活的几点讨论》
- 《城市与边缘的工人阶级（专刊建议）》
- 《伐修社《必然报》的批判如何暴露出无知》

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有机关系”内涵：见《呼声》编辑部的《我们的组织任务》

下载站：

<https://shiyiyue.codeberg.page/rev1/html/%E5%8D%81%E4%B8%80%E6%9C%88%E8%AF%84%E8%AE%BA%E7%BC%96%E8%BE%91%E9%83%A8%E5%9C%A8%E7%BA%BF%E9%98%85%E8%AF%BB%E4%B8%8B%E8%BD%BD%E7%AB%99.html>

混乱融工潮：组织建设的失败

目前“进厂融工”、“进厂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培养工人先进分子”已经几乎成了今天实践的革命学生小组的共识。这些学生小组有些已经在工厂小规模地做“工人工作”----在工厂内和工人打好关系，灌输马列毛主义，有些停留在对这种“融工”的想象中，停滞在创办网络左翼报刊（线上宣传员与鼓动员则是丝毫没有发展起来），或是沉浸在对自己为自己定下的“线上培养线下融工干部”阶段性纲领感到的满足感中（凭个人兴致参与网络讨论）……这些都是小组工作自发进展（很多甚至连小组都称不上，和兴趣社团没有区别）的体现。那么为什么我们空有“融工”这样的一整套理论共识却没有真正用它来指导小组的革命实践？我们必须指出：用来指导实践的，现在的“融工”思路是错误的。这是小组实践失败的一大原因，第二大原因是：中国城市的中产阶层化、教育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导致接受马克思主义（尽管普遍浮于表面）的学生与体力劳动工农家庭背景出身学生在社会关系上隔绝。本文主要探讨第一大原因，即融工思潮的错误。

融工思潮本身非常碎片化，众说纷纭。本文并没有反对“融入工人”本身，而是反对基于“融入工人”发展出的各种机会主义小组路线。

1. 丧失计划

在《当前革命的组织任务》中，笔者引用了大段著作在前人的基础上陈述过：摆脱手工业方式不仅需要和当地广泛的小组、左翼革命者联系，更是需要制定一个长期的，坚持革命的计划。而融工这种思潮往往是碎片的，断层的。很多组织停留在空泛地谈“进厂建立广泛的革命家组织”，“培养工人革命家”，“组织起工人”，并把这些碎片的论点聚合起来取代了小组纲领，于是学生小组工作长期在这种与现状断层的“纲领”摆设下停滞（连自发进展都没有），学生小组成员与领导层往往因为其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还有资产阶级深入日常的反动意识形态影响）自发的向革命挥舞白旗。中国左翼的圈层化同时也一步步加深。

2. 组织建设原则

“现在，在二三月事件之后，在原则上大家都会同意这一点了，但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原则上而是在实际上解决问题，需要的是立刻提出一个明确的建设计划，使大家能够立刻从各方面着手进行这种建设。但

人们又把我们拉向后退，使我们不去实际解决问题，而去空谈那个原则上正确的、不容置辩的、伟大的、然而却是完全不够的、广大工作人员完全不能理解的真理：“培植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可敬的作者啊，现在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究竟怎样来培植和培植起这种组织“

同样地，问题不在推崇融工的朋友们所说的真理：“到工人中去！”，问题一直在于：既然我们还没有先锋队，还没有无产阶级政党，既然我们的方向是建党，那么怎么建党？这不是一句“到工人中去！”，或者“培养工人革命家！”就能解决的。

一个组织的计划是从发展自身，建设自身的原则出发制定与完善的。“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如果脱离了它所服务的进一步组织目标，脱离开了「一个松散学生组织究竟怎样才能发展到具备建立广泛工人组织的条件」这个位于“广泛工人组织的建立”前面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成为了断层的思潮取代组织纲领，那么正所谓语句具有“主观能动性”，这句话即使是原模原样照抄列宁或者毛泽东，放到现在作为融工思潮的一大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必须反对的，

“建立广泛的工人组织”，在这个建立的背后自然

有一个建立方----我们。既然我们的一大阶段性目标是重建党，那么我们所做的需要向着重建党前进，建立方需要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融工派的逻辑是：我们为了发展成无产阶级先锋队，就要建立广泛的革命小组。而广泛的工人革命小组需要围绕着一个先锋队的雏形----职业革命家圈子----而建立，没有把建立一个先锋队的雏形同步提上纲领，建立再多的工人革命小组也是反集中制的。到这里是正确的，而他们在提出断层的“建立广泛革命组织”的同时，在丧失计划的同时就在把“先锋队的雏形之形成过程”与“将工人革命组织从零开始发展到广泛”的过程相割裂，把职业革命家组织的建立过程自觉地滞后，这就导向了群众运动高潮时期党内凭空出现一个核心领导群众运动，与夺权划等号。可以看到，这种思潮是自发倾向托洛茨基主义的。

或许融工派们说：“职业革命家主要就从先进工人当中来，而我们早就说过进厂培养先进工人分子成工人革命家”，可怜的同学，你们这句话的性质还是和“建立广泛的工人革命组织”一样！无论是培养还是建立，你们都抛弃了对自身组织客观发展情况的长期设想，去谈论脱离开不同时期小组客观条件的，不

切实际的小组工作。在培养工人革命家时，我们的组织情况是怎么样的？在小规模的工人革命家们“培养”完成的时候，小组的发展情况又是什么？此时如何组织起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如果此时小组任务和原先相比（原先在“融工小组”力量薄弱时融工派们阶段性地忽略职业革命家组织的立即着手建立，把小组工作局限于培养工人革命家）总体上是沒有变动的，那么融工派们也无疑投到了托洛茨基怀里----集中制原则被取消了，自我发展形成职业革命家组织的任务被取消了……

为了不陷入托洛茨基主义及其变种，我们必须重申组织建设（发展）原则。小组计划、路线或者纲领的制定需要从组织建设原则出发。

组织建设原则是，我们规划小组事务时从头到尾应当根据不同时期组织与整个社会现有的客观情况（或者设想将来的大致情况），制定不同的组织任务，这些组织任务也是互相串联在一起的，一个任务是为了另一个更进一步接近重建党、发动人民战争的任务而设立，这些任务按时间顺序相连着，导向重建军事化共产党，导向人民战争的发动。（不过当然，不必要设想遥远在未来的一些组织建设细致内容）

比如，学生同志进厂在与工人交流中将先进工人吸纳入组织，这一步是为了紧接着的工人们参与组织任务分工，一起在工厂宣传鼓动中逐步形成一个紧密的高度觉悟革命分子圈子而设立。而这一步之后形成职业革命家圈子雏形的客观条件之一就具备了。

单单断层的“建立广泛革命组织”是空洞的。很多人认为将来建立职业革命家的事情很远，因此可以不考虑，我认为这有问题，如果始终不把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成立定为方向，我们的组织实践就容易违背集中制原则。

《当前革命的组织任务》中我列的计划就是从组织建设原则出发制定计划的例子。

相反的，不能自发地在谈及路线、方针策略时把自己抹去，这是空洞的。“建立广大的革命家组织……”，没错，我们已经听腻了，就在这位朋友在谈“建立”的时候，我们要指出：建立方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情况中呢？建立方建立起“广大的组织，广大的组织之建立服务于建立方自身的建设，而他们谈建立方自身的建设的时候把问题偷换成（或局限于）了“建立方----即我们自身组织，建设自己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就建立这样的基础，从而建设

党”这一抛开组织自身视角出发的空泛、断层的问题，这从根本上回避了“我们怎么办”、“怎样把我们建设成党”这些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取而代之的是连接于火热准备进厂的学生小组与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间的未被理论和计划填上的空洞。正因为这种理论上的贫乏和计划上的缺失，融工派们自发地倒向了托洛茨基主义。

3. 托洛茨基之夜的回天

“要留在无产阶级之中，而不是脱离无产阶级”，“我们通过唤醒群众最简单的政治本能来实现群众的革命化”，多么革命！托洛茨基所说的这句话涵义和“融入无产阶级”无比的一致。托洛茨基认为的“到工人中去”，是让广泛的工人参与党的民主决策，以此培养工人的政治觉悟。他说：“委员会将起草一份决议，向大会提出彼得堡工人的要求，而这份决议则要是由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同宣传员、鼓动者一起进行详细研究。他们会在组织的各个支部中进一步传阅决议，并进行投票统计。”

“如果工人对政府在饥荒期间的行为只是举行了一两百人参加、涉及一两个城市的抗议，那就还只是一种单纯的“教育”办法，而如果抗议在整个俄国形成

一股日益壮大的浪潮，聚集起成千上万抗议的无产阶级呼声，那它就具有了政治意义……一个具有政治思想和政治觉悟的中心则将把党的一切有生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这就是无产阶级中觉悟较高的阶层在反对沙皇专制的普遍民主斗争过程中、在政治上反对统治阶级组织时要走的道路。正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才能使我们的政治斗争具有阶级性“

融工思潮和托洛茨基的观点不谋而合：主张不从自身组织建设的原则出发，也就抛弃建立集中制的先锋队架构原则，优先的把广泛的工人空泛的拉入一个预设好的，没有具体形态的组织（党），加以“提升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这个名号（区别于托洛茨基的是，融工派把列宁的灌输论切割出碎片强加到这种抛弃原则的思路：“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带给工人！”“知识分子培养出工人革命家！”……）。

“在做好充分准备后，地方委员会就可以在一个具有政治思想和政治觉悟的核心的领导之下，散发充满义愤之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举行相应的群众示威游行，以此组织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反对自治机构和报刊界的可耻行径。假如我们党有一次，哪怕只有一次，这样严整的战斗行动，它就会完全振奋起来，

有用的人们就会涌现出来，就像大颗的坚果在摇晃时就会升到顶端”，托洛茨基如是说道。他在这里倒是设想了一个“具有政治思想和政治觉悟的核心”来支撑他对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得到充分发展后情境的幻想（很显然，没有这个核心的预设他的理论就不攻自破了，因为没有有一个“核心”的领导就不会有所谓“严整的战斗行动”），而他提出的种种论调却是取消建设一个这样的“核心”的。融工派的论调何尝也不是它的变种：挖取列宁的“先锋队领导工人阶级”并将其作为一个服务于建立自身逻辑自治的预设放置在还没建设先锋队这一计划的革命路线上，实际以这种方式回避了怎样从无到有建设先锋队的这个问题：建立先锋队就需要广泛的群众组织和革命家组织，建立广泛的这些组织这件事对我们自身组织建设上的要求就是建立广泛的这种组织！（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把融工路线定为组织路线的组成的话）

另外“发展无产阶级的政治主动精神”，“使工人阶级革命化”这种论调一旦碰上背后丧失组织建设原则出发和集中原则的基底，这种思潮就会自发导向：我们的夺权形式是全国性的“总政治罢工”，或者包括游行、集会示威或没有先锋队领导的武装斗争的总运动：“在可能的情况下举行相应的群众示威游行，以

此组织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反对自治机构和报刊界的可耻行径。”……抛弃了先锋队，那么无产阶级实际上将作为一个自在的阶级脱离开了阶级的自觉集中部分。这种脱离造成了这么一个奇怪的情景，仿佛无产阶级在知识分子的鼓动下能自动组织到一起，魔法般取代资产阶级这个整体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取代途径就自发导向通过一场预设好领导方，实际却取消领导方的全国性运动夺权。

“到工人中去！”“和无产阶级融为一体！”“开始实践！”这等口号是多么的革命，从十年多前开始，中国的“革命派”们就截取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微小碎片——它的表现形式仅仅是这种口号，以此为仅有的脱离行动范畴的“理论”，并加以“马列毛主义的理论”之名。他们是如此地坚定“融工”就必定是“革命的实践”，使得任何否认或质疑他们所谓“融工”的观点他们颇内都预设有一个脱离开辩证法的反对，之后只要续想脑补出“论战”双方的成型观点，翻找那几本著作批判就可以了。“竟然反对融入工人，你背叛了革命！”……他们后续做出百般老调重谈的理论批判也是陷入“生产网络文化符号—审美”的循环。意料之中，本文定也会多多少少遭到当代大字报的批判。

最后，请听听伟大导师托洛茨基是怎么攻击组织原则的吧。“因此，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就来得五花八门：多半是唱一些所谓专制和官僚主义、所谓盲目服从、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等等幼稚的动听的高调……“虽然托洛茨基过于无理取闹了点，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融工派所谓的丧失原则的“融入无产阶级”自发地倾向到了反对列宁式先锋队的一边，并且因为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隔离与自己的圈层化加深，不断重演“文化符号----审美”循环，在背叛革命的路上越走越远，这是比托洛茨基主义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

如何理解“左翼圈层化”

用“圈层化”这个词来形容某类人群，一般意味着这类人群有以下几个特点：1，该群体因为某种因素，导致该群体内部分裂为多个相对独立的圈子，且这些圈子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2，每个圈子中都有与其他圈子相异的特质，并对本圈子有高度认同感与归属感；3，圈层化的人易陷入信息茧房，导致一定认知偏差和群体极化；4，圈层化往往和身份认同与标签化密切相关，默认以此定位自我与他人。显然，当代中国左派群体就呈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面对着各式各样的历史遗产，不同人因为各种因素，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不同的历史遗产，并据此划分了各式各样的“阵营”，另一方面，因为当代中共对线下组织的忌惮与强力镇压，不仅导致马克思主义者们难以进行代际间的传承，还使得大部分左翼更多时候都是在线上接触到其他左翼，除此之外，也只能依靠线下的人际关系，以近乎碰运气的方式来寻找身边的左翼了（或者把身边的人变成左翼），这种种原因导致中国左翼难以结成具有物质力量的线下组织，更多的，则是停留在各个平台的左群中，不得不陷入一种彼此孤立的状态。

态，更有甚者平日只进行着圈地自萌或者是对本平台其他左翼，发动意识形态圣战的活动。

要深究形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我们还要回到对现实的分析，对当代中国左翼群体的考察之中：当代中国政府虽然自 18 年佳士事件后，对线下的左翼组织和进行了严酷的打击，但与此相对的，对线上平台的管控可以说是比较宽松了，而这些左翼，大多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说是家庭条件处于中产阶层的学生们，在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下的士绅化的进程中，这些学生的家长们虽然过着比无产者更为优渥的生活，但是却时刻面临着破产至无产者的焦虑和阶级跃迁的渴望，到了子女那里，就演变为了来自家庭与学校的双重学业压力，这种境况和中国革命历史与当代马克思主义浪潮的碎片化相结合，形成了当代的中国左圈，区别于那些真正有志于社会革命的人，这些学生们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被压力了，需要一个发泄口，才有了这样的扮演革命身份以求一种身份认同的情况，再加上段首所说的情况，线上平台成为了他们发泄的绝佳去处，这些人也普遍缺乏与真正参与线下阶级斗争的组织或者人的接触交流，最终形成了左翼圈层化的现象。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要克服这样的困境，就不得不组织起来，介入现实。“革命范畴里的理论和实践不是个人的，而是集体的，并且不是一般的集体，而是政治理论和实践。”只有明确提出组织问题，才能将那些真正有志于革命的左派和只是将其作为饭后消遣的人分开来，在建立富有有机关系的革命政治组织和对现实社会的分析研究的过程中，审视我们要接受哪些历史遗产，摒弃哪些谬论，最终才能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形成一个统一的阵营，形成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路线

谈组织与革命问题

2025 年了，我们都应该做一个深刻的反思：墙内平台已经经历了很多次政治讨论风波，各种与当代中国相关的观点在网络左翼圈子内密集碰撞，在此之中，网络左翼圈子逐步扩大、内部分层差距拉大……

今天，有多少学生朋友认识到当代中国的修正主义实质呢？他们和圈外人的社会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在这一人群内，又有多少是不抱有个人投机思想，毅然选择走一条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呢？

判断一位学生是不是一位明智的革命派，应该看他是否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革命化建设当中。即便自己实在没有找到或者打听到当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真正彻底的革命派也毅然会一人依靠人际关系，从无到有建立组织，并考察当地的社会关系拟定一则长期的，坚决斗争的小组计划。

如今左圈（如果进一步细致分，是左圈中位于最内层的，已加入到各种学社、小组的知识分子们）的发展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年复一年，我们不能任由“左圈”继续自然分化，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急于“进厂融工”，却搞不清当地社会关系，没有建

党路线计划的组织一个个重演兴起消亡的历史，相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必须行动起来，在可能爆发的社会运动中敢站出来号召鼓动（我们往往过度重视地下，而把公开斗争阶段性地完全取消了！当然这应该建立在存在地下组织力量的基础上），同时与当地周边的其他左翼建立联系，整合各个地方小组，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达成基本的统一，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会前进。

“组织起来！”……我们喊了一次又一次，将来还要更加激烈地呐喊，更加广泛而勇敢地号召！

当然，也是时候反思我们的宣传号召行动了。空洞的号召还是革命的号召？这取决于我们是否深入到我们（包括宣传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开展革命宣传。在官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触手渗透入日常，控制住我们的四肢，使我们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口头革命，实际却看似“自觉”地投机到一条追求安稳的个人道路之时，生活与革命事业的割裂、脱离恰好暴露无遗：在这之中，马克思主义还在继续被包装成文化符号或封建教条。我们需要休息，需要保证健康的睡眠时间和强健的体魄，需要培养革命情怀，而这些为的都是更好地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当中。

但是正如列宁在《致中学生》中对中学生南俄组织所说：“我们衷心祝贺学生们坚毅的创举的同时，要向学生们提出同志式的忠告。希望你们努力把自我教育、培养自己成为坚定刚毅和坚忍不拔的社会民主党人作为自己组织的主要目的。把这项极端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同直接的实际工作尽量严格地区分开来”。我们的日程安排（实际工作）主要是围绕什么而列的？是向着重建党而来的革命事务，而不是通常所谓的“个人生活”或者“个人培养”，不是停留在组织内部以文艺批判为形式的什么“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

迅速使地方小组政治化！我们必须天天提，动不动就提。政治化的含义很简单，其一意味着列宁所说的“把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组织起来”，如将再生产纳新、地下战斗工作、内网舆论工作等组织事务长期接受组织的统一分配，而不是由个别靠工作量脱颖而出的同志单方面一时兴起进行一些组织工作的筹备，或者长期停滞在寡头政治局面，由极少数核心直接分配其他成员的任务----这样的组织和马克思主义兴趣社团几乎没有区别。一个政治化的革命学生小组，是经

过了在不可避免的原始松散组织关系之中领导层—成员有机关系的建立过程的，并已经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关于“有机关系”，请见呼声编辑部的《我们的组织任务》和《革命组织和知识分子》）在这种有机关系的确立下，革命工作的各个部分将被标准化地组织起来，一个行动的确立和展开是为下一个紧接着当前活动的、最终导向重建党的细致目标，而不是间歇性、无计划的。当然，政治化还要求在深入日常生活的斗争中，建立牢固的组织基础，分配实际工作。这在前文中已被论述。

很多学生同志认为现在群众都持冷淡或保守思想，因此止步于建立地方组织。群众永远不是悲观主义者。从六四运动的学生海洋中开着拖拉机，高举红旗向天安门进发的工农群众们，到佳士运动中示威争取成立工会的工人们以及支援他们的市民、学生，包括地方一些老干部们……到八·五江油示威运动中向警察反抗的同胞们，还有每年大大小小千余起工人罢工……群众随时准备好了斗争，只是需要有一个坚决斗争的党来领导……党由谁主导建立？由我们自己，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们。

很多同志想到如今密集的监控网络，又开始怀疑城

市人民战争的可行性了。事实上 25 年 10 月的例子就可以证明，我们是可以使用镜子定位并用激光笔照射摧毁或者干扰敌方监控设备的。敌方的监控就像地雷，战斗队的职责之一就是在党领导群众公开斗争的前夕扫清一个个地雷。

此外并不是说警察一定会非常容易地逮捕革命派。要想引起官方的注意，并让它有彻底消灭摧毁你革命计划的打算，这是有前提的----你必须有足够的价值，使政府得以耗费自身的警力人力追捕你。如果组织的活动地下保密做得到位，我们也是可以做到一般时期处在群众的秘密武装海洋当中，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中使自己的立场、行动看上去难以琢磨，在党号召发起大规模斗争时站出来敢于牺牲走在群众前面（当然，需要服从党的一个分阶段的战略）

必须承认，左翼知识分子（大部分为学生）于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地位。如今一种可追溯到毛泽东时代的，以革命过程的幻想为标榜的道德指教在中国左圈的内层十分流行。仿佛一个人不“融工”（实际上有些同志甚至不知道他们所谓融工和进厂的区别），不在网络反对一些人的错误言论，就是向修正主义投降，就被批发什么“安托西修”的高

帽。他们斥责学生（实际是一种无能的自责）“小资产阶级”，或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同时却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阶级分析也丧失了。学生不属于任何阶级，而是家庭生产地位和关系的延伸。

很多组织或个人对学生性质的误判自发倾向了几乎所有组织问题都被看成了出于小资产阶级本性的必然逻辑，融工论诞生或被接受的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而学生不是，学生要摆脱自己小资产阶级性质就要成为工人，于是他们进厂打工，同时试着启发几个关系紧密的工人……这样感性主导的所谓小组实践，恰恰是丧失长期的，发展到重建党的目标及计划而投奔向托洛茨基的。我们在《我们的组织建设》中探讨过融工论的错误。

在这个社会，任何人活着都不能逃脱资本主义再生产。容许我们对一些用封建礼教包装马克思主义的教徒们这么化用一段话吧：“我感恩马克思，我感恩列宁毛主席，我是学生，我辜负苍生，我有罪”……

关于线上组织与线下组织：我们认为从职能讲，线上组织要么接受线下组织的领导（且在主要成员与线下地方组织重合情况下），要么汇聚不同地方小组成员的实践经验与一些不涉密的参考资料，作为一个统

一联合部交流用（可以组织一些线上宣传和集体写作学习，讨论出共识）。不存在线上为主的阶段。一切革命工作最终都是回到地方上的。实践告诉我们，互联网本身就是去中心化与高度匿名的，而组织----它本身最高形式的体现之一就是各个成员地方上的关系，而绝不是停滞在依托互联网建立的关系。

写作这篇文章的用意是在对一些流行的错误思潮的反对和优秀前辈们总结出的观点中宣传革命的意识形态指导各个地方的小组实践。现在一些常见的问题得到了回复，组织起来的号召也必须更加强有力，更加细致到日常生活。在最后，让我们预祝打倒中国社会帝国主义的持久人民战争的胜利。

祝你早日组织起周边的同志，为重建党而斗争！



流里報